

不断推动国史研究繁荣发展

宋月红

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

核心阅读

国史研究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进入新时代，国史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繁荣发展。面向未来，要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贺信中，对国史研究提出殷切期望，强调要“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进一步推进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中国成立后，国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新时代，国史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史料整理和通史、专门史、专题史研究编纂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学科理论与方法日渐成熟，为深刻揭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规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史研究的起步、兴起及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新中国史也由此开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紧密联系。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两周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其中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此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两年来的历史。国史研究蕴涵并融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成

为这一学科后来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史研究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领域史料的整理编纂上，体现在社会历史调查、地方志与“家史、厂史、村史和社史”的编写上，表现在总结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经验以及对外讲述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发展面貌上，其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五年史、七年史和十年史上，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年史分作“新中国诞生”、“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建设时期的开始”进行记述，一些高校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著作。这一时期，我国史学界的研究重心虽然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上，但国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为改革开放后推动国史研究从中共党史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学术研究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至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历史作了基本分析，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揭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及其活的灵魂。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将新中国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围绕“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掀起研究编纂国史的热潮，国史研究就此成长为一门学科并发展起来，其学科属性、地位和特点日益突出，与中共党史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相辅相成，研究内容与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式方法和手段也日益丰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史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重要著作，其中有两部重要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第一部是大型丛书《当代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著述，按系统、部门、行业和地区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50年历史。丛书在编写中收集和运用大量翔实、丰富、系统的史料，既从总体上贯通性地记述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又分类分专题记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和外事工作以及科技、教育、卫生、产业、民族、宗教和环保等方面的发展史，从中总结各行各业和各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第二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集中记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35年的历史，突出体现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深刻揭示新中国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意义。

新时代十年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史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历史、学习党史国史等系列重要论述，将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推动构建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新时代十年，国史研究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学科建设更加成熟，研究队伍更加壮大，学术交流活动更加活跃。

在研究内容上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重要问题的研究。新时代的国史研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通史、专门史研究更为全面，微观层面的个案和专题研究更为细致。比如，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在新中国历史上，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围绕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国史研究坚持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再如，在改革开放史研究方面，出版了《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改革开放40年：历程和经验》等著作，全景式记录和展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在研究形式上更加系统多样、全面融通。比如，组织实施“纪录小康工程”，以数据库为主要载体，按照“分层分级、总体联通”原则，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以“全景录”“大事记”“变迁志”“奋斗者”“影像记”出版系列丛书，记载小康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典型人物、重要事件，呈现党领导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实践进程，反映城乡和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较为全面地记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彰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

在研究成果上陆续推出高质量的研究著作。比如，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材料。出版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新中国70年》和丛书《新时代这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等，有力推动国史研究繁荣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必须牢牢

把握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分期，后三者都属于国史研究的范畴。国史研究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推进新中国史与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和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等学科相融合，做好自身基础研究理论、应用研究。尤其是要求研究好阐述好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更好反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面向未来，国史研究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立体、全面、系统地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研究，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研究，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研究，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深入推进新中国通史研究编纂。新中国史是不断延展并向前发展的历史。国史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专门史、专题史、阶段史，更需要通史研究编纂，系统揭示关于新中国发展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深刻阐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各领域各方面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这就要求国史研究者深入挖掘史料、加强史料学建设，拓展研究领域，丰富体裁体例，并紧跟时代发展推进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创造性转化我国传统史学关于通史研究编纂的体裁体例、方式方法，深入推进新中国通史研究编纂。

拓展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国史研究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特别是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要向国际社会讲好新中国史，概括提炼易于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关于国史研究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好地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融合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入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片甲骨惊天下”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拥有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诸多重大发现，展示了中国辉煌历史和中华文明巨大成就，在中华考古史、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殷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发现地。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历经90多个春秋，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综合看来，殷墟考古主要有以下收获：一是基本搞清了殷墟的总体布局和结构。安阳西北洹水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形成面积约36平方公里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其中，小屯村东北为宫殿宗庙基址，有明显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建筑格局，小屯村北发现有制玉作坊，小屯村南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洹水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为王陵区，共发现大墓13座，包括武官村大墓、妇好墓等，有一定数量的人殉与牲牲以及排列密集的祭坛。二是发现了以小屯村为中心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包括礼器、酒器、兵器、乐器等，以鼎、觚、爵、尊等较为常见。除青铜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四是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殷墟是殷商历史的主要确定地。由于时代较早，历史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殷商历史除商王谱系以外的更多细节无从知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向我们展现了殷商历史。在通过甲骨文确定殷商历史的诸多学者中，罗振玉考释出大量甲骨文单字，提出了至今仍被学界遵守的甲骨文分类，而且明确了甲骨文出自安阳小屯，判断甲骨文卜辞为殷商王室遗物，小屯就是商代都城“殷墟”所在。王国维将甲骨文与殷商历史研究相结合，对甲骨文中的商王谱系与文献进行实证研究，使殷商历史成为信史。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大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相结合开展研究，深化了对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的认识。董作宾于1928年在小屯附近首次进行考古发掘，并陆续主持八次殷墟发掘，首次提出由“贞人”之名推定甲骨文断代五期十标准说。已被释读的甲骨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方方面面，如阶级与国家方面、社会生产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等，全方位展示了商代丰富的历史，极大弥补了商代文献的不足，对中国早期历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殷墟发掘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一是培养了一支现代考古的专门队伍。主持过多次殷墟发掘的李济、梁思永等人，成为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和知名学者。二是促进了考古技术与方法的改进与提高。首次殷墟发掘，采取轮廓法、集注法、打探法的工作步骤，取得了初步收获。第二次发掘则对小屯等地进行了地形测量，对器物进行了记录，对地层进行了划分，对器物的型式进行了区别。第三、第四次发掘均采用“卷地毯”式的探查方法，对建筑遗迹的揭露有较多帮助。第六次发掘解决了“坑内套坑”的现象。第九次发掘甚至找到了后岗的一段龙山文化夯土城墙。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发掘，打破坑位的限制，利用“平衡”的技术予以行之有效的深度测量和比例照相，取得了较好效果。三是推动了早期考古文化体系的构建。殷墟的发掘不仅为我们认识晚商文化奠定了基础，也使我们中原地区早期文化有了初步认识。比如，1931年通过发掘后岗遗址，发现了殷商—龙山—仰韶“三叠层”，科学确定了若干文化之间的关系；1933年通过发掘浚县刘庄村、滑县小屯村和浚县辛村，确认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随着多种遗存的调查和发掘，殷墟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对殷墟的探索让我们对“何以中国”的认识更加清晰。珍贵的历史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重视和加强考古工作，继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为河南大学教授）

殷墟考古的主要收获和重要意义

张新斌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新载体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首发式述要

齐声

客观真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表故事，需要有效载体和高效平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日前在京举行首发式。该书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交流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与会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英文版是迄今首次公开出版的权威党史著作中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著作。该书在保持与中文版一致的权威性、

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系统性、针对性基础上，努力达到著作翻译的“信、达、雅”标准。该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对外宣言，是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对外宣传，是党和人民声音的对外传播，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创新理论和伟大实践，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提供了真实、珍贵、权威的“第一手”译本资料。

信息快速

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

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

郭京宁

年来，我国考古学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取得丰硕成果，重要考古发现不断涌现，文物考古研究不断加深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那些被发掘出来的古代遗址、文物遗迹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清晰呈现中华文明的绚烂底色，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古都，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70年建都史。一直以来，考古工作者根据北京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揭示了北京从山前聚落、北方重镇发展为大国首都的历程，为全方位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为推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支撑。北京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通过周口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知道北京是中国最早出现古人类的地区之一，这为中华文明探根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佐证。新石器时期上宅遗址、雪山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北京与中国北方地区多地存在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西周时期北京地区的礼制、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丰台区新宫发现的夏商周时期聚落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该时期带环壕的聚落遗址。金中都考古发现了丰富的隋唐、辽金、明清时期遗存，为研究北京城的变迁提供了新材料。通过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基本特征，这为进一步认识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

实支撑。

我国拥有数以亿计的文物资源，充分说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借助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研究视角，让出土文物活起来，让逝去的场景再度显现，引导人们更好认识历史、更好传承文明。新时代新征程，考古工作者要根据我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研究为支撑，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做好考古成果挖掘、整理、阐释与传播等工作。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研究教育与公共服务功能，培育多元参与的传播主体，打造丰富多样的传播内容，创新融合传播方式，让文物考古成果走向大众。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打造文物对外交流合作品牌项目，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

学苑论衡

XUE YUAN LUN HENG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考古事业的重点任务和发展方向，为我们深刻领会考古学的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推动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把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作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百余